

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与大学文学教学

殷满堂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文学经典受到冷遇。为避免文学经典受漠视,彰显大学文学教学对传承文学经典的意义,应改善大学文学教学方法,即注重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其具体做法为:注重对文学经典的选择,注重现代读解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经典;文本细读;教学

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9)02—0117—04

—

学术界习惯于把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时代称之为消费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文学经典受到了冷遇,大众文化则受到了热捧。文学消费中,尤以图像化、影像化、快餐化、大众化的消遣性文学,受到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青睐。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大学文学教学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学经典在当下的尴尬处境,除了时代社会的原因之外,还与大学文学教学的状况有着必然的关系。我把大学文学教学分为两块:一是文学史教学,一是文学理论教学。传统的文学史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注重对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具体作品的详细分析。即使讲解作品,也存在着模式化倾向,不论是讲解什么样式、类型、形态、风格的文学作品,都始终遵循着一种模式:作家生平与时代背景介绍、作品思想意义与人物形象分析、作品艺术特色概括。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打击了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兴趣,也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使得大学生面对一部具有无穷魅力的文学经典,走不进它的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中去,对作品更是缺少具体独到深刻的体会和领悟。文学教学中的文学史教学如此,文学理论教学也问题多多,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文学批评脱节,注重文学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原理等的理论阐释,而忽视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即使讲作品,也只是将其作为

讲解某种文学观念的例证材料,对作品的分析往往也只是点到即止。大学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如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针对 1985 年以后“西方理论学说的不断引进,导致了学术界盛行新方法和新理念,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逐渐取代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文本细读逐渐不被人们所重视”^[1]的事实,提出了文本细读对于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意义,并在自己的教学中践行文本细读的原则与方法,在 2005 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作者对文本内在精微之处的独到的解读,对隐藏在文本中的缝隙的质疑,让学生掌握了领略文学风景的钥匙,给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古典文学界倡导文本细读的呼声也极高。王富仁教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解读的文章,发表在 1991 至 1995 年的《名作欣赏》上。这些文章,是将现代的文学文本解读技巧运用于古典文学作品分析的成功尝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近年来,慕课中开始出现了文本细读的大量尝试,如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的“唐诗经典”慕课及其相关教材《唐诗经典研读》,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文学理论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组织编写的《文学理论教程》的最大特点,是在讲清文学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特别加强

作品论这一编,用六章篇幅解析阐述文学作品的各个方面。这一点是以往文学理论教科书很少有的。此教材出版后,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并多次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先需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文艺学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工作。在他组织和领导下编写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文本解读》这一套文艺学系列教材,就是文艺学课程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他们将文学文本解读课作为学习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先导课程,将激起诱发学生对文学浓厚的正当的审美趣味作为文学文本解读的主要目标。这些教材的出版与课程设置,无疑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学生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综上所述,文本细读在文学教学中的这些有益尝试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说明了文本细读对于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笔者认为,加强大学文学教学改革,应从加强课程改革做起,大学中文系应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文学经典的文本解读”课程。这门课程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大学阶段掌握具体可操作的文本解读的方法和技巧,提高学生阅读文学经典、鉴赏艺术美的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经典意识,提高学生的欣赏品味,让学生从自身生存状况出发,叩问文学经典的意义,体悟人生的价值。

二

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首先应该从文学经典的选择做起。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这就涉及如何选择的问题。在文学大海中,经典无疑是每个读者的首选。何谓经典?哪些属于文学经典?学术界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经典起码应该有以下三项标准:“一、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够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质和价值理想的作品;二、经典具有独特性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三、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间是经典最公正的评判者。”^[2]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往往反映了人类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情感,因而能超越种族、时代和地域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虽然经典标准人言人殊,但是这三个标准应该是被广泛接受的。但这三个标准又只是一种原则性标准,在对文学经典的具体选择上,可能会因缺少可操作性而形同虚设;那么,选择经典有没有更为客观科学可操作性的方法呢?当然有。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数据科学的发展及广泛运用,文学研究中也开始使用统计学、数据分析等方法,例如王兆鹏

教授关于“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就运用了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百首唐诗经典从三个方面做了数据统计分析:“一是诗歌选本。采用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当代有代表性的70种诗歌选本进行统计,看每首作品入选的次数是多少。二是评点资料。每种资料对作品的评点,无论是褒是贬,是艺术分析还是记述本事,都按一次来统计。三是当代(1949—2000)研究评论唐人单首诗篇的论文。三个方面的数据统计出来后,再进行加权计算。选本、评点资料和研究论文的权重分别拟定为60%、30%和10%。”^[3]我们姑且不论这三方面数据的权重比例是否合理,但这种科学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大体还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以此所确立的文学经典也是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当然,人文学科应该遵从其自身特点,不可全以科学方法取而代之,比如,杜甫的《秋兴八首》是代表杜诗乃至七言律诗最高成就的经典之作,然而却未出现在这一排名中。因此,我认为,文学经典的选择,还是要充分地从人文学科的特点出发,适当地借鉴现代科学的方法,这样选择的经典才有代表性。

文本细读法是20世纪初期英美新批评所建立的一套批评理论与方法,是指从文学文本的内部语言、结构等入手,通过对文本的音韵、修辞、文体等因素和文本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所形成的关系的仔细分析,挖掘文本意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对19世纪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只注重从作家个人的生平与心理、社会历史与政治等外部因素来阐释文学意义的彻底反叛。这种极具操作性的实用批评,甚至被批评家们用在了大学课堂的文学教学中。如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就选取13首诗歌,去掉诗歌作者和题目,让学生在没有任何作者与时代等外在背景的情况下,从文本语言、结构、修辞等方面去分析作品的意义,并通过对学生的成果进行分析总结,从而确立文本细读的原则、范畴与方法。文本细读法经过燕卜苏、布鲁克斯等人的不断完善,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如布鲁克斯运用细读法分析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西敏寺桥上作》和玄言派诗人唐恩的《圣谥》,对两首诗歌中语言的悖论作了细致的分析。那么,面对文本,如何展开细读呢?

首先,文本细读应该从字词开始。文学经典尤其是诗歌经典,字词句往往是经过诗人句锻月炼的结果,诗歌的审美意蕴往往凝结在这些关键字句中。中国古代习惯称这些关键字词为诗眼、文眼。因此,

对这些诗眼文眼的把玩,是进入文本内核的关键。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文本细读绝不是孤立地对文本的字句作琐碎的解读,而是立足于全篇,对文本的审美意蕴、艺术风格等的整体观照,字句的微观细读是为对文本的宏观把握服务的。如王国维曾评论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4](P193)}宋祁《玉楼春》中“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即诗眼。“闹”字的妙处,不仅仅表现在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描绘出春天里红杏绽放枝头、争奇斗妍的画面,表达了诗人对春天无比的喜爱之情。这一“闹”字,把诗歌的意境传达出来了。又如杜甫的《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一诗中的“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两句,要准确地把握这首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就必须从分析这两句诗中“乱”“悬”两字入手。写灯在风中晃动,诗人别出心裁用到了一个“乱”字。这个“乱”字,既写出了灯的摇晃导致灯影的杂乱,同时又是诗人离别友人时的心绪凌乱。同样道理,“悬”字亦如此。诗人写雨,不用下雨、落雨,而用悬雨,既是写雨大而急,也是用“悬”字来表现诗人当时的心境。因此,透过对这个字的分析,我们把握住了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融入到了诗歌所塑造的意境之中。杜诗在用字上堪称经典,因此解读杜诗要从用字入手,方能把握杜诗的奇理、别趣。解读其他经典亦然。

其次,文本细读应关注经典文本中的隐喻、象征、双关、复义、反讽、悖论等修辞手法。经典之所以是经典,还在于其文本所呈现出的意义的含蓄、丰富、多义的特性。文学经典中的隐喻、象征、双关、反讽、悖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为各个时代的读者提供了多元性的阐释可能。在这些修辞方法中,隐喻最为独特。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人类的思维形式,有人称为隐喻思维、诗性思维、艺术思维等等。文学经典中无不充满着隐喻,因此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首先要从发掘文本的隐喻义入手。《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就体现了隐喻思维,如《关雎》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水边绿洲之上栖息的双鸟婉转鸣叫,隐喻人类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西方诗歌中的象征也体现了一种隐喻思维,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颂》用西风的宏伟气势来象征革命无限伟力,诗的最后用“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岂会遥远”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对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就要来临的坚定信念。由此看来,隐喻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具有本体

意义。除此之外,文本细读还要善于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与方法,如英美新批评的反讽与悖论等。且看钱钟书先生对王禹偁《村行》“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诗的分析:“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王夫之《思问录·内篇》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而破除之也。’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5](P8)}钱钟书先生从山峰无语中,分析出了山峰“有语”与“无语”的矛盾,从而分析出这首诗通过“正话反说”所隐含的反讽意义。

第三,寻找文本结构上的缝隙,注重对文本深层结构的分析。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家想要表达的意义与文本实际表达出来的意义往往会不一致。西方结构主义理论家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来解释这种不一致。所谓表层结构,就是根据叙述的字面顺序,研究作品中各个单位之间在作品中的关系;深层结构则是研究叙事内容各要素在叙述顺序背后的内在关系。从表层结构所看到的是文本的表层意义,而对文本深层结构的分析,则是挖掘文本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可能蕴含的深层含义。以唐传奇《柳毅传》为例,文本的表层结构可以简述如下:柳毅应举——落第——马受惊而跑出道外——遇龙女——龙女讲述自己的遭遇(嫁给泾川龙王的二儿子,丈夫为放荡之子,龙女向舅姑哭诉丈夫的行为,舅姑溺爱儿子龙女被罚牧羊)——龙女请求柳毅带信给洞庭君——解下衣带叩社桔入水见龙王——洞庭君哀恻——洞庭君把爱女受难的事向暴躁的弟弟钱塘君保密——钱塘君怒发而挣断锁链——龙女得还——钱塘君大胜并被赦免——柳毅严词拒绝钱塘君婚媒回家后两次明媒正娶——柳毅在拒婚后的遗憾两度亡妻——最后娶一父亲不知所往的寡妇——成仙得道。从表层结构来看,文本讲述的是柳毅和龙女历经磨难,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是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在中国传统叙事文本中大量出现;但若对此文本作进一步深层结构分析,我们会发现:文本中人物凡是按照常规行事,最后都得到不幸的结果;凡是脱离常规的行为,都得到了幸运的结果。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文本背后隐藏的意义:对现实和习俗关系的怀疑,渴望从超越常规中

寻求到幸福。^{[6](P266~267)}这一层意义不一定是作家意识到或想要表达的,但从文本的分析中,我们确实得到了这层意义。这就是文本结构上的缝隙。

第四,注重文学经典的互文性解读,探索经典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联,从而挖掘文学经典的丰富意蕴。文学经典的解读,除了从经典文本自身即字词句篇去解读其意义外,还需要从此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去分析其更为宽广的意蕴。虽然文学经典具有独特性、无可替代性和高度个性化等特性,但并不意味着文学经典是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之外的一种纯客观的存在,相反,任何一部文学经典都或多或少地与前代经典发生关联。西方文学理论将之称为互文性或文本间性,即处在不同时空中的各种文本互相发生意义联系,从而形成文本意义的相互指涉。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比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用典,宋人对杜诗的读解,“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7](316)}。“无一字无来处”虽有点夸张,但后世之作都无法避开古人或他人的文字、语义、结构和风格等等,都是在继承中有所创新的结果,任何经典无不如此。李商隐的《贾生》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上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段文字构成了互文关系。解读此诗时,只有联系这一文本,才能弄清楚这首诗的反讽意味。中国文学如此,西方文学亦然。

20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荒原》,艾略特引用了36个作家、56部作品作典故,若不知道这些典故的出处及其文化蕴含,是根本无法读懂这首经典之作的象征意味的。当然,互文性分析还包括此文本与其他相似文本之间的比较分析,如《金玉诗话》云:“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斗丽搜奇者尤众。如‘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四望疑无路,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皆见称于世。然莫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雄壮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8](P1947)}宋代诗论家蔡绦将唐代诗人可朋《赋洞庭》、许棠《过洞庭湖》、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的《登岳阳楼》等几首同写岳阳楼的诗作互文性解读,从而来说明杜诗何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即诗人胸襟的博大,故其诗景象雄奇,意境深远。因此,文学经典只有置入历史文本中去解读,方能显示出对文学经典解读的深度与厚度,经典文本的解读,必须嵌入与之相联系的文本系统。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2).
- [2]张岂之.何谓“经典”?[J].华夏文化,2014(1).
- [3]王兆鹏.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J].文学遗产,2008(2).
-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5]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8]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